

【中】李丽辉 (Lihui LI)

个人简况

李丽辉 (1964--),女,河北省抚宁市人。199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工作。现为西安财经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陕西省经济发展研究会理事。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

邮编:

电话: 13992870009, 02982348344

E-mail: lilihui_xc@163.com

主要著作

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主持、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新自由主义的矛盾与替代选择

【中】李丽辉

内容摘要：本文概括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内涵和特点。分析了其理论主张中的矛盾性，同时指出世界上实施完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国家实践中的失败。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的关键在于没有完全实施新自由主义主张，而是从实际出发，不断纠偏，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矛盾 替代选择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内涵与特点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也称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后在反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包括的学派主要有：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其中，伦敦学派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现代货币学派是新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学派。这些学派之所以都归入新自由主义的学说范围，是因为它们在一些基本思想方面具有共同点。

第一，主张市场化，反对国家干预。

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拒绝利用国家干预来稳定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但推崇“市场万能”的市场机制作用，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他们认为国家调控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只有实行市场竞争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提供为技术进步所需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灵活性，而国家的宏观管理和干预恰恰阻碍了技术进步。国家采取的任何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归根到底都是徒劳无益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国家不干预经济是对经济最好的管理。要使经济保持稳定，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国家听任经济自然发展。

新自由主义同时认为，个人自由主义是自由市场制度存在的基础，也是经济自由的基本出发点。个人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才能保证社会的进步和创造。尊重个人自由，就要让个人在市场中自由选择，国家不应该进行干预。这种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是效率最高的，因而也是最好的制度。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说：“人类的主要问题是，这些有限的关心（事实上它的确决定了人们的行动）是怎样能够产生有效的刺激以使他们自愿尽其所能为那些他们不了解的需要作出贡献。经济学家们认为发展完善的市场是一种使得人们加入比他们所理解的更为广泛深入的一种过程的有效方式，正是通过市场才使得他们能够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目标贡献力量。”在自由市场制度下，个人在为自己利益进行努力的同时，可以自动地为别人和社会的利益作出贡献。

第二，主张私有化，反对公有制。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私有化的狂热拥护者，认为私有制经济具有自身内在的稳定性，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私有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经济的均衡，使经济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上。私有制经济的这种优势是公有制经济所没有的。

新自由主义还认为，私有制经济的最大好处在于它保证了个人的自由，私有制不仅是有产者个人自由的最重要保证，也是无产者个人自由的最重要保证。这是因为，穷人通过个人努力就可能致富，而且穷人致富的努力不会受到任何人的阻碍。包括穷人在内的任何人，都有选择职业的自由，都能够通过施展才华和努力工作致富。虽然在私有制社会里，富人在机会方面受到的限制要比穷人少得多，从而人们收入可能不均等，但每一个人致富的机会是均等的。

新自由主义又认为，私有制能够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应当用个人自由高于一切的观念来支配个人的行动。由于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个人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没有人加以限制。企业主可以在不受任何束缚的条件下充分发挥积极性，从而使价格下降，国民收入上升，需求增加，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

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产权神话”的，极力反对公有制。他们认为，在废除了私有制的公有制社会里，穷人名义上成了公有财产的主人翁，但同时却不得不服从于拥有极大的垄断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完全受这个庞大的管理体制所支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私有制社会是一个富人得势的社会，公有制社会是一个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社会，而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要比一个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更好些。依哈耶克所见：“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这个唯一的缘故，才没有人来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在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或是属于独裁者，谁操有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管制我们。”

第三，主张经济全球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广到世界范围，从理论和政策上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颂扬实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美国通过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来主导世界经济运行，不赞成许多国家要求重新建立或健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意见。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各国取消任何经济保护，让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除了劳动力要素）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实现贸易和金融的完全自由化与国际化，最有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他们重点向不发达国家推销其经济理论和政策，要求这些国家不顾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国内外条件是否成熟，尽快实行完全的利率自由浮动、外汇自由交易等金融自由化，尽快取消关税和对外资的产业限制政策等贸易自由化。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站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赞扬它们凭借其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会计准则的一系列组织和行业规则来控制世界各国，实行美国模式的世界经济一体

化。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批评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他说，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许多规则是由他们共同制定的。它们会在每个国家都实施“结构调整”的“四部曲”：第一步是私有化，准确说就是腐败化。在这个过程中，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第二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第三步是价格市场化。在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它引发骚乱和动荡，进而引起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外国公司就趁机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第四步是“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把这种贸易自由化比作以金融和财政手段进行的鸦片战争。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回归斯密）的现代自由主义。按照英语世界的传统，这就是“右”的，“保守”的，称之为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更能显示其本质，也符合英语传统的准确称谓。正如智利的拉美经济与国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S·比塔尔所指出的：“在拉美，‘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被用来指实现私有化、放弃管制、减少国家的作用以及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中扩大开放度等经济政策。但在英语中，这一政策方法被称作‘新保守主义’。”

二、新自由主义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巨大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先进与否，必须根据其对生产力的适应性来判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先进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落后的。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主要内容。所有制的先进与否，同样必须根据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就是先进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就是落后的。从理论上讲，随着分工的发展，生产的日益社会化，国际化，要求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和支配。在实践上，一方面存在着生产资料共同支配的技术障碍；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平衡的。因此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程度及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实践也证明了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的股份公司正是这一规律的要求，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入口。欧盟等一体化组织的出现也验证着这一点。新自由主义者在国际上鼓吹私有制，反对公有制的目的，是要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主张挖不按市场化，反对国家干预，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有效性，进而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尽管西方一般均衡理论也认识到市场价格

和均衡价格不一致和非市场出清的可能性，但是为了证明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它总是试图从理论上寻找避免非市场出清条件下出现交易的可能性。为此，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是设想存在一种机制，使得人们根本不可能在“错误的”价格上进行交易，二是设想价格的调整过程是如此迅速，以致于人们来不及进行“错误的”交易。前一设想就是瓦尔拉斯和埃奇渥斯的“重订契约特权”，后一种设想就是马歇尔的“瞬时调整过程”。然而，无论是“重订契约特权”，还是“瞬时调整过程”，都不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前者，人们不知道那位全能的“价格制定人”是谁，也不知道谁赋予了交易者以“特权”；对于后者，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成本不为零决定了价格调整的速度不会很大，更不用说接近无限了。如果交易者没有“特权”的保护，而价格调整的速度又不是很快，那么在非均衡出现之后和调整到均衡之前的这段时间，就一定会出现非市场结清条件下的“错误”交易。西方一般均衡论者并非完全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实际上已不把一般均衡看作一种现实的存在，而是看作一种参照系。新自由主义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肯定一般均衡的稳定性，而在于把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绝对化，不在于肯定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在于把市场经济理想化，从而看不到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政府适度干预的必要性。

“自然失业率”理论是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一种新理论。所谓自然失业率，就是劳动市场供求均衡时的失业率，也就是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这种自然失业率理论有几个突出特点。第一，自然失业率同“自愿失业”、“摩擦失业”的存在并不矛盾。换句话说，即使社会存在“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劳动市场也仍然处于均衡的、充分就业的状态。第二，“自愿失业”是由工人不愿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引起的；“摩擦失业”是由工人转换工作岗位或劳动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引起的。总之，这些失业都是由工人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第三，由于价格和工资是完全弹性的，所以，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自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充分就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第四，实际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是由预期价格与实际价格水平不一致引起的，而这种不一致只是短暂的。第五，政府实行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至多只能在很短的时期内使实际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过不多久，实际失业率就会回复到自然失业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却比以前提高了。因此，通过扩张性经济政策降低失业率，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第六，资本主义国家实际失业率的提高，是由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引起的，与非自愿失业无关。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还把工会组织当作垄断组织，认为工会是导致工资水平过高，失业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组织中最危险的，应该加以反对。这些观点说明，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反对劳工权益的思想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新自由主义者把反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主张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使货币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相适应，最好使货币数量保持一个固定的增长率。这种看法不能算错。但问题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如果出现负面的供给冲击，那么通货膨胀和失业就会同时存在。当通货膨胀和失业都比较严重时，需求管理政策就会面临究竟是要通货膨胀还是要失业的两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权衡通货膨胀和失业

的利弊得失，而不能简单地把反通货膨胀作为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而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也不能简单地规定一个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而必须根据选定的政策目标进行操作。

新自由主义者是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应该看到，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达国家始终是强者，发展中国家则始终是弱者。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始终是相对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大资本利益，而相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中小资本利益的。从[历史](#)上看，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和政策，总是受到发达国家和大资本的欢迎，而招致落后国家和中小资本的抵制。被称为世界经济“三大支柱”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都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操纵的，它们所制定的一系列国际规则和政策，也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志。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三、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

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把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与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密切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社会主义中国应对新自由主义矛盾的合理替代选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的中国模式的核心内涵。

市场经济产生在私有制社会，并不能否认公有制条件下不能搞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就已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的优势，既提高经济效率有保障公平，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效统一。

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仅体现在量上更体现在质上，体现在控制力上。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坚持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经济，它遵循的是价值规律，在交换中竭力维护和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一切规律的根本出发点。市场经济实行优胜劣汰，它不仅要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使用或利用效率，同时导致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市场对金钱的贪欲，造成了人对物的崇拜，出现了人和劳动本质的“异化”现象。市场经济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痼疾，这是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固然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在部门间、地区间的流动来调节和平抑收入水平，但市场机制在本质上并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效率主要是市场的任务，公平主要是政府的任务。在人类社会和平发展时期，市场经济是最具效率、最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没有市场万万不能”；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的本性是趋利的，它可能把人们内心深处最自私、最卑鄙、最龌龊、最残忍的感情呼唤出来，使社会充斥着“潘多拉行为”：贪得无厌、尔虞我诈、假冒伪劣、欺行霸市、坑蒙拐骗等等。因此，驾驭市

场经济的能力,首要的是必须具备有效克服市场经济弊端的能力。这就要求在高度重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同时,必须加强政府治理和宏观调控,有效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创建一种能够避免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

由于历史的巧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与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复兴在时间上大体一致。新自由主义声称最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体系即自由市场经济不仅体现个人自由选择的理想,而且能够在效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分配的公正等方面使经济绩效达到最优化,在一个公平的、自由竞争的世界秩序里,任何政府干预、介入经济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他们提出“市场决定论”和“全球化决定论”,并把二者等同起来,创造出全球化不可避免,全球化对任何人都是一件好事,全球化将在经济各个领域均衡发展并创造出“平等的活动平台”等一系列“神话”。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是为全人类谋利益,实质上是试图在变化了的世界形势面前,为维护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全球扩张的利益和需要而将其披上“全球化”的外衣。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假全球化之势与自由市场之名运用自身优势去畅通无阻地剥削发展中国家、努力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理论工具”,因而是对客观全球化的利用、篡改、歪曲和误导,是客观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异化和变种。这就要求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和范式保持清醒的认识,深入揭露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实质,充分重视和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宏观调控,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把自由、效率、竞争与有序、公正、平等真正统一起来。

经济全球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市场化或市场全球化。而市场经济总是与经济危机相伴随,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就深刻揭示了的。只要有市场经济,就有经济周期性波动,就可能有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时又要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把市场经济产生的波动尽可能控制在可承受的幅度范围之内,最大限度地预防或消除经济危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孕育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之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还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区域性、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威胁,随时都有被卷入全球性经济危机旋涡的可能。

近年来,全球新兴市场国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如1994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危机、土耳其危机,2001年阿根廷危机、土耳其危机等,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恶劣影响。全球化时代,经济危机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快速扩散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对与其经贸联系密切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短期内,对主要危机国的经济构成毁灭性打击。如,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到邻近国家,引发了亚洲金融风暴;阿根廷金融危机迅速诱发了拉美经济危机,等。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在社会化的市场经济中,计划手段优在宏观层次,对调控社会经济资源有长处;市场手段优在微观层次,对微观资源配置有积极作用。“由于市场活动主体的信息不完全性和非对称性,使市场主体具有盲目性,一味地

追求利益最大化难免会导致整体供需的周期性失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加以规范和引导,必将会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这个时候,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也就得以显现。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其经济开始广泛地、深度地融入到全球经济当中。对外经济贸易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交往,就有摩擦。经济学界研究成果表明,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已经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根据入世的承诺,中国面临入世15年内“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允许成员国对我国出口产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入世后,世贸组织成员国纷纷加强了对中国特别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的立法工作,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条款相继出台。2003年起中国同欧盟、美国纺织品贸易战愈演愈烈。中国正在取代原来的日美、美欧贸易摩擦的中心地位,成为全球贸易摩擦新的中心。

要有效预防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妥善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离开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单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显然是行不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方面致力于改变高度集权和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党和政府全面插手经济、国家经营企业的历史和传统,推行权力下放、政企分开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同时坚持对整体经济的宏观调控,不断提高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能力。把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取得了伟大成绩。在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彼此协调立场,使通过的国际经济规则尽可能对自己有利;在制定各自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磋商与合作,尽可能防止产业结构的雷同化,避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两败俱伤;在处理国际经贸关系时,要从本国利益出发,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相机调整发展战略和经贸政策,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真正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3] 李其庆,刘元琪.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4] 陈恩富.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J].求是,2005,(3).
- [5] 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6] 宋殿清,李碧浩.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新探[J].学术交流,2004,(11).
- [7] 傅殷才主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出版。
- [8]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
- [9]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
- [10] 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

[11] 亨利·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及其本质》（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13] 王宏伟：《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三篇短论》（J），《理论经济学》2003年第2期。

[14] 张五常：《卖橘者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